前　言

1930年前后，一批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数量的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爱国者、朝鲜共产主义者先后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同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一道，反对中国封建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种参加旅居国革命的现象在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

当《共产党宣言》刚一发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便遭受到各国所有反动势力的联合反对。这一“共产主义幽灵”对比当时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的确势单力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当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取得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幽灵”才在世界上唯一的国度里化为活生生的现实。长时期以来，社会主义的苏俄仍然为世界各种反动势力所仇视。为此，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当时，各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和被压迫民众，都把苏俄看作自己的“祖国”。中国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曾经纷纷前往苏俄寻求真理，汲取知识，参加过苏俄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运动，为旅居国的革命事业而献身。当时，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革命事业，凡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参加所在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既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献身，也是为本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同样，过去有不少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因他们的国家长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被迫流亡中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其中也曾经有相当一批人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以及抗日斗争事业。他们同样抱定一个崇高的信念：参加旅居国——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抗日斗争事业，同时也是为争取祖国朝鲜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对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切反动势力极尽挑拨之能事，诬蔑这些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是所谓“中共的走狗”。这在过去韩国的或别国的一些出版物中，在某些人的言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一切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种现象，本来是可以不屑一顾的，因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它刚一出现在欧洲时即遭到一切反对势力的攻击，然而，这一“幽灵”并未因此消失。如果反对势力仅仅限于这种谩骂式的攻击倒还罢了，他们还用出版物和传播媒介对历史事实加以明目张胆的歪曲和窜改，这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出版物可以留传后世，混乱视听。一些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的老一代共产主义者，当然可以不置一顾，无所畏惧；而对于当代一些不谙历史的年轻人和未来人，却仍有予以澄清和交代的必要。

实际上，中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史学家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著述，对于上述历史的事实，还很少予以全面的揭示和记述，致使这一问题的历史真相仍然鲜为人知，使一些反动势力在这一问题上对各国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恶毒攻击和肆意歪曲还有某些市场。

经历过 20 年代和 3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老一代共产主义者，今天在世者为数已经不多了。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能够实事求是地揭示和记述这一历史现象，不仅可以直接得到他们的指教，而且相信他们也会由此而感到欣慰。

只是著者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识所限，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和记述过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有这一类历史事实。因而只

能根据本人多年的探索和研究，仅就本世纪 30年代发生的一批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组织，一批朝鲜革命者、抗日战士曾经在同一地区参加过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考察和记述。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用这一研究成果，在批驳和澄清一些反对势力就这一历史问题所进行的歪曲和攻击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为便于澄清历史，著者在记述中使用了较多的历史资料以为佐证。

其次，关于历史上在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和作为朝鲜国移居中国的侨民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至今学术界还在探讨。著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殖民统治以前大致可以划为一个时期。在此时期内，凡祖居中国和长久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朝鲜族居民，以及近代朝鲜移民中业已加入中国国籍者，都属中国的朝鲜族居民；此外的大量朝鲜移民仍属朝鲜侨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 14年时期，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将大量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给予双重“国籍”(即既有日本国籍，又有“满洲国籍”)，而且将东北地区原有的朝鲜族居民和大量被迫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也一律给予双重“国籍”(即既是“日本国籍(朝鲜半岛)”，又是“满洲国籍(鲜系)”)。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实施的这种“国籍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予承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建立、统一的国籍法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国家已获独立，民族已获解放，大量过去被迫移居中国的朝鲜侨民返归朝鲜故土的情况下，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对待东北地区的原有朝鲜族居民和在此之前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移民，当然视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与中国各族人民一道享有一切权利和义务；业已长久定居在中国东

北地区的朝鲜居民，事实上也被视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同中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中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同样分得了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在解放战争中许多朝鲜族居民或参加人民军队，或承担支援革命战争的战勤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部分朝鲜居民经过一定的手续，正式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同原有朝鲜族居民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成员。

一、朝鲜人迁居中国东北概况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山水相连，两国人民自古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自 17 世纪中叶以后，两国边民往来渐多，各自政府为避免纠纷曾屡下禁令。19 世纪 70—80 年代，中国政府相继解除了延边地区和东边道地区的禁令，朝鲜政府随之也正式废止国境封禁令。此后，朝鲜边民大量拥入鸭绿江和图们江沿岸中国一侧地区定居开垦，中国政府还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长约 350 公里、宽约 25 公里的地区划为朝鲜移民专垦区域，允许朝鲜移民在此定居，租给土地，开垦耕种。不久，自朝鲜迁来的居民日众，中国指定的这一专垦区已无法容纳，朝鲜移民遂越出这一区域，自行深入延边地区和东边道地区以至其他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1909 年，延边地区有朝鲜定居农民 184 867 人①；1911 年，迁入东边道地区的朝鲜农民达 58 950 人②。

1910 年，朝鲜完全为日本吞并之后，朝鲜人民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更大量迁居中国东北。据统计，1920 年，朝鲜人在中国东北地区已达 459 427 人；1926 年，达到 542 185 人；1930 年，增至 630 982 人③。

关于这一时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数量，还有下列统计可供参考：

①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 页。
②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第 5 页。
③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第 4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0 年 6 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全国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在向会议提交的《关于在满洲的高丽人问题提案》中认为：

自1910 年日韩合并以来（朝鲜移民）其数（量）急激增加，而每年达五六千至一万人之多。现在…… …移住者总数已过百万人以上。①

1947 年 1 月 10 日，前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在中共吉林省委群工会议上所作的《延边朝鲜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认为：

九一八以前，中国官方统计在满朝鲜人数为 120 万人……

1929 年 7 月 25 日，前朝共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上海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洪南杓，曾以江宇的化名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中认为：

1910 年—1919 年 3 月 1 日韩国独立运动大示威以前，这十年间……移住总数 130 万多人。②

1930 年 1 月 30 日，在一份《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中写道：

①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11 页。

②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 第 7 页。

朝鲜人散居满洲各地的数目，无处寻得可靠的统计……但据我们向各地询问的综合起来，统共不过为 130 万上下之数。①

1930 年 5 月 24 日,在一份《中共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案草案》中认为：

在满洲的韩人共计有 130 万余众,除其中 50 余万密居②于延边四县——延吉、珲春、和龙、汪清以外，其余则分居于南北满各县……③

在江宇的前述《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中认为：

今据 1928 年 2 月，我们满洲总局和正义府之调查，则在满韩侨总数为 193 万多人，这亦是不很严密的调查了。如果施详密的调查，在满韩侨总数，实超过 200 万以上了。④

1930年在一份《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满洲有韩国农民将近 200 万人，这是满洲一个基本革命队伍……⑤

①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 集，1989 年刊行,第 379 页。
②密居，即密集居住之意。
③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702页。
④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13页。
⑤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6集，第 377 页。

1930年 6 月 1 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中的朝鲜农民代表李浣，在向会议提出的《关于满洲农民情势及满洲一般情势的报告》中说：

（在东北的朝鲜人）一般韩人间推定的数目，认为约有300 万上下。①

上述各种统计数字，众说纷纭，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缺乏认真调查统计而造成的，多数都是一种约略的估计而已。著者经研究认为，据 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朝鲜族人口总共有 1 763 800 余人，其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居住的共达 1 750 300 余人，占绝大多数。因此认为距今 50 余年前在东北的朝鲜居民即已达 100 万、200 万、300 万的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据推定，1930 年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约有 63—65 万人，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强占中国东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日本殖民统治者更有计划地强迫向这一地区移居大量朝鲜农民，以便让出朝鲜土地，容纳由日本向朝鲜迁居的众多日本移民。因而，朝鲜农民被迫背乡离井移居中国东北地区者急剧增加。据统计，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数量逐年变化如下：

1934 年　　717 213 人②

①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6 集，第 425 页。

②玄圭焕：《韩国移民史》（上），第 168页。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122 页。

1936 年　　875 908 人①
1939 年　　1 065 523 人②
1943 年　　1 200 000 人③
1944 年　　1 700 000 人④
1945 年　　1 692 342 人⑤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见，朝鲜居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数量在日本占领时期急剧增加，1939 年突破百万大关，日本战败前夕达到 170 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几乎占当年中国东北全境人口总数约 3 900万人的 4.4%左右。

这些自朝鲜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除多数定居于靠近中朝边境的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林、辽宁两省毗邻的旧东边道地区外，还广泛散布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

周保中在《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报告中说：

> 朝鲜居民在东北分布状况：延边的延、汪、和、珲、安图 5 县最多，且密集居住年代极久，其次为鸭绿江西旧东边道——通化地区。再其次为桦甸、永吉、蛟河、舒兰、五常，以及沿牡丹江流域、松花江哈尔滨下游迄乌苏里江左岸。

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东北地区农

① 玄圭焕：《韩国移民史》(上)，第 168 页。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122 页。
② 《满洲年鉴》(1939 年)，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138 页。
③ 朴昌昱：《试论朝鲜人的迁入及其历史上限问题》，《朝鲜族研究论丛》第 1 集，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21 页。
④ 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
⑤ 松江省政府编：《东北统计汇编》，1947 年刊行，第 4 页。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140 页。

民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广泛开展的地区，同时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最为活跃的区域。

历来迁入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他们到达东北各地后，有 90%的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其中 75%是贫苦农民。

周保中在前述《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中说：

> 九一八以前，在满朝鲜居民 90% 以上是经营农业，特别是高度农作的水田，而农民绝对多数是小佃农和赤贫佃农，工人与季候工人及经营商业和其他事业的是很少数人……

仅以延边地区为例，据 1933 年伪间岛省对迁入的朝鲜农户的统计：

阶　级	户　数	比　例
地　主	5 114	0.5%
自耕农	12 832	25%
自耕兼佃农	13 280	25.5%
佃　农	25 456①	49%

这些贫苦的农民在朝鲜，除遭受本国地主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外，还因亡国而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的民族压迫，只好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和久居的家园，迁入中国东北。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早在中国清代政府开禁招垦时期迁入的贫苦农民可享受某些优待以外（诸如提供住房、粮食、种子，代购耕牛，

①《间岛农业机构概要》，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314 页。

延期纳租等),后来历年陆续迁居东北的朝鲜移民虽然也已长期定居中国，由于其中多数并未加入中国国籍，依然不能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生活十分困苦。

周保中在前述《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报告中指出：

> 九一八以前，朝鲜居民中有入中国籍的，但为数非常少，绝对多数是侨民，这些朝鲜居民大部分是从朝鲜逃避日寇而来的。

据 1919 年 6 月中国政府就吉林省珲春、汪清、和龙三县的朝鲜侨民和已加入中国国籍者状况的调查，列表如下：

朝鲜侨民居住县份	朝鲜侨民总户数	加入中国籍户数	百分比
珲　春	4 774	1 025	21.5%
汪　清	2 846	336	11.8%
和　龙	13 458	417①	3.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中国东北长春附近，一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并借机动员媒介大肆鼓噪，歪曲真相，掀起反华浪潮。当时，国内报刊也针锋相对，严正地揭露事实真相，予以反击。《中央日报》曾载文指出：

> 据 1931 年上半年南京政府统计，东北朝鲜侨民入中国籍者总数为 51 858 人。其中,辽宁省为 8 310 人,吉林省为 36

①参见吉林省档案馆档案第 2949 卷 6-4 号,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 86—8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60 人；黑龙江省为 7 388 人。如依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侨民约有 65 万人计算，加入中国籍者则仅占约 8% 左右。①

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朝鲜之后，为进一步染指中国东北，便利用朝鲜人向中国移民的机会，将朝鲜移民当作其侵略中国的工具。据 1924 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日本国籍法》规定：日本国民可以脱离日本国籍，但并不适用于朝鲜人。凡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即使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者，却仍然被视为“日本国民”。此即所谓的‘双重国籍’。日本政府借口管辖侨民，强迫中国政府承认其外交特权，即所谓‘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东北有朝鲜侨民居住的地方强行派驻领事机构，将侵略的触角伸入中国东北的一些地方，以便随时挑起纠纷，扩大事端。为此，日本极力阻挠朝鲜侨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同时，中国政府为避免与日本发生纠葛，也拖延或拒绝审批朝鲜移民加入中国籍的申请，并时或强迫他们出境。结果，朝鲜移民不仅未能完全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压迫，而且增加了中国军阀政府的又一民族压迫之苦。

由于朝鲜移民大多数仍为侨民身分，依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凡外国侨民未取得中国国籍者，一律不得享有中国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得充任各级政府之职员和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员，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矿业开采权等等。因此，占朝鲜侨民中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便不得不租入土地耕种，或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农。租入土地又必须有人为之担保，于是一些乡约、牌头或早已“归化入籍”的朝鲜居民出头，向地主租得大量土地，然后再行分租给朝鲜移民，从中盘剥渔利。朝鲜移民不但备受封建地主的剥削，还要遭受中间人的剥削。朝鲜移民将这些中间人称为“二房东”，即二地主。所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贫苦农民所

①《满洲韩侨人数与职业》，《中央日报》1931 年 8 月 6 日。

遭受的封建剥削，较之其他各族贫苦农民更加深重。后来，在朝鲜农民广泛开展的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将这类“二房东”式的地主分子当作首要的对象，绝非偶然。

1928 年 2 月 29 日由中共满洲省委制定的《东边道工作决议案》中指出：

> 东边道和吉林省东南各县百余万的朝鲜农民都是从日本殖民地——朝鲜逃来的。他们比中国的农民更有难形容的痛苦。在政治方面，中国官僚对待他们的残暴，较之对待本国农民，可谓“赏赍有加”，并且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他们在那一带大小各县中专设“大日本帝国警察出张所”去“看管”或“压迫”他们。在经济方面，除去饱尝一般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而外，还有丧失耕地的危险。东边道朝鲜农民对土地的关系，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关系完全不同。第一，因为他们未入籍，无论贫富不能享有土地权。第二，朝鲜农民多种稻田，将荒田变为水田较之变为旱田，所费资本当然多得多。因之水田比旱田的地价更高，并且水田所收获的米，比较旱田所收获的高粱等要多值一倍以上的代价。因此种种，所以中国地主不断的〔地〕夺回朝鲜农民（开垦）的土地，转租给他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自朝鲜移居到这一地区的居民，同东北原有的中国各族人民一样，全部沦为亡国的奴隶，同被视为伪满洲国的“国民”。虽然此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被视为具有双重国籍（即“日籍”与“满籍”），但实际上仍然被当作殖民地的奴隶对待，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沉重的殖民剥削以及封建剥削。广大朝鲜贫苦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悲惨命运，并未得到任何的改善。

总之，历年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其中的大多数是

贫苦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他们在政治上先后遭受中国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在经济上一贯承受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地主的沉重盘剥，因而同东北各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一样，具有强烈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封建军阀、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制度的要求，能够而且必然会加入东北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斗争行列中去，而且后来同东北各族人民一道又投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洪流中去，还成为其中的重要革命力量和抗日力量。

二、朝鲜共产党被解散及其满洲总局的解体

(一)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被解散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侨居苏俄远东地区的朝鲜先进分子酝酿组建社会主义团体。1918年6月26日,李东辉等在俄共（布）远东宣传员贾列格鲁诺夫的支持下，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立了“韩人社会党”。翌年8月，李东辉到达中国上海，参加“韩国临时政府”，该组织的重心随之移至上海。1921年1月，韩人社会党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改称“高丽共产党”。后人即称之为“上海派”。

1919年9月5日，金哲勋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舒米亚茨斯基的支持下,也于伊尔库次克成立了“全俄韩人共产党”。这个组织是由已经加入苏俄籍的朝鲜人组成的。该组织在1921年5月改称“全俄高丽共产党”。后人即称之为“伊尔库次克派”。

上述两个组织相互歧视，矛盾日增，甚至还发生过武装冲突。

高丽共产党和全俄高丽共产党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中，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中，高丽共产党组织在延边、东边道和饶河地区建立了区域性的本部和若干基层组织。据有关资料记载，由朱健等人在1921—1922年建立过“间岛朝鲜共产党”；由韩彬、朴允瑞(朴衡世)等建立过“满洲高丽共产主义青年会”,人们称之为“满共派”。全俄高丽共产党在饶河、宁古塔(宁安)、敦化等

地建立了组织，金哲勋也到达北满一带开展活动；张时雨、全龙洛等在延边地区于 1922—1923 年间建立过“满洲朝鲜共产党”等等。

上述高丽共产党和全俄高丽共产党组织，都还不是独立的统一的朝鲜共产党，而是类似各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的共产主义小组式的组织。其中，高丽共产党曾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全俄高丽共产党则是俄国共产党(布)的分部，是隶属俄共(布)领导的俄国朝鲜族的共产党组织。当时，在苏俄，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曾经建立了一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以便于组织苏俄各民族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开展工作。虽然这些苏俄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都负有帮助他们各自的祖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任务，但是它们是俄国共产党（布）的下属组织的性质却是确定不移的。

1922 年底，共产国际决定解散上述两个党的组织，并重新在朝鲜组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不过，上述两个组织却名亡实存。不久，“上海派”在朝鲜建立了“无产者同盟会”，人们称之为“汉城派”或“汉上派”。1923 年 5 月，“伊尔库次克派”在朝鲜建立了“新思想研究会”，后改称“火曜会”，人们称之为“火曜派”①。

1924 年 2 月，由朝鲜留学日本的学生组建的“北星会”，在朝鲜成立了“新兴青年同盟”。“北星会”后来改称“北风会”，即人称之的“北风派”。

1925 年 4 月 18 日，上述三派朝鲜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在汉城召开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并选举金在凤为委员长。随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然而同年冬，朝鲜共

①马克思诞生日是星期二，朝鲜和日本皆称星期二为火曜日。该派以火曜会为名，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

产党中央即遭到日本占领者的破坏。

1926 年 2 月中旬，由姜达永、洪南杓、金缀洙等又组成了朝鲜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姜达永任责任书记。这一届朝共中央于同年 6 月再遭敌人破坏。在此期间，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上海和日本建立了海外总局，作为朝共中央的代表机关。

而后，由于党内意见分歧，北风派中的“一月会”部分成员安光泉、金世渊、韩伟健（李铁夫），上海派的金缀洙、吴义善和汉城派一部，联合组成“列宁主义同盟”（后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即后人所称“ML 派”。1927 年 2 月，由金缀洙等组成的朝共第三届中央，1928 年 3 月，由车今奉等组成的第四届中央，又连续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大破坏，朝鲜共产党从此陷入瓦解状态。

关于朝鲜共产党的这种状况，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员会奉中共满洲省委之命派出代表，同朝共满洲总局代表会谈时，朝共代表就朝鲜共产党的历史作了简要介绍。现将 1929 年 9 月 24 日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共中央转抄哈尔滨市委关于朝鲜共产党报告中有关部分摘记如下：

> 韩共是 1924 年[①] 成立的，本来不甚健全，经过 1926（应为 1925）年新义州大检举及六四（应为六十）事件（借韩王之死扩大宣传），重要干部捕捉逃亡殆尽，从此以后，韩共就没有正式的中央了。但是共产主义的团体是有的，并有许多派别，其主要者有：（1）京城青年会——此派完全建筑在学生教员基础上，不作群众工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组织，后分为两派；（2）ML 派，此派取名 ML，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以联共逐出无政府主义化合者朴允世

① 应是 1925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